



杨昌济教育思想简论

长沙市出版

湖南教育出版社

期 限 表

杨昌济教育思想简论

李沛诚 著

责任编辑：洪长春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20,000 印张：5.25 印数：1——6,000

统一书号：7284·98 定价：0.95元

目 录

引 言	(1)
一、“与日新之世界同时并进”	(6)
二、“寂寞之事业”与“神圣之天职”	(21)
三、以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全面发展	(35)
四、鼓励学生“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48)
五、重视学生智育的发展	(67)
六、“教育不可不置重于体育”	(81)
七、主张合理安排学校的课程	(95)
八、热心于教育的普及和提高	(110)
九、注意发现和培养人才	(125)
十、做“专心致志”、“久于其任”的好教师	(138)
结束语	(150)
附录：杨昌济教育活动、教育著作简介	(153)

引 言

杨昌济是中国近代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是一位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教育家。

一九三六年在陕北保安，毛泽东同志曾与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谈到自己青年时代的生活时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①

杨昌济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决不只是毛泽东一人。五四时期湖南的进步青年蔡和森、邓中夏、陈昌、罗学瓚、张昆弟、李维汉、肖子璋、周世钊等人，都受过杨昌济爱国、民主思想的陶冶。从一九一三年春到一九一八年的五、六月间，杨昌济利用课堂讲学、课后交谈等各种方式，满腔热情地向这群青年介绍了西方进步的政治学说、哲学思想和伦理观点，传授了大量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和政治历史知识，同时，还以平等态度和他们一道严肃地讨论紧迫的社会、人生的各种问题，鼓励他们积极投身于正在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正是由于时代潮流的推动和杨昌济进步思想的

①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出版。

影响，终于导致了五四时期著名社团新民学会的创立。

毛泽东于一九二〇年编写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曾概括地叙述了新民学会诞生的三个原因：第一，发起诸人“只觉得自己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热切到十分。”第二，“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第三，“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①新民学会成立时的二十一个“基本会员”，除了罗章龙是第一联合中学的学生以外，其余的二十人都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或肄业的学生，都曾或长或短地“与闻”过杨昌济的“绪论”；即使是罗章龙，也因与毛泽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以后，经常去“板仓杨寓”聆听过杨昌济的“绪论”。他们的那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的养成，都与杨昌济进步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至于新民学会于一九一八年四月成立时通过的章程，其中规定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和“不伪虚”、“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纪律^②，正是和杨昌济的一贯主张相吻合的。许多年以后，李维汉曾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说：“杨怀中先生来北大教书前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和高等师范的伦理学教员，思想开明、进步，为人刚正、真诚。新民学会的成立以及我们思想上的‘向上’都同他对我们的影响有关。”^③

①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

②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新民学会会报报告》（第一号）。

③ 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载《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

新民学会早期会员，在省立一师三班毕业的肖子璋（肖三）曾经回忆说：“杨昌济（号怀中）先生对毛泽东同志和许多同志影响很大。杨先生是长沙人，在第一师范教伦理学、论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哲学。他曾在日本留学六年，又在英国留学四年，但始终不离中国的理学传统，喜讲周、程、朱、张，喜讲康德、斯宾塞和卢梭的《爱弥儿》……杨先生并不善于辞令，也不装腔作势，但他能得听讲者很大的注意与尊敬，大家都佩服他的道德学问。他的讲学精神，使得在他的周围，形成了认真思想、认真求学的学生一群。——毛泽东同志、蔡和森同志、陈昌同志……等。每逢星期日，他们相率到杨先生家里去讲学问道。杨先生是海人不倦的，也很器重毛、蔡、陈等几个学生。”^①肖三这段不太长的文字，客观地介绍了杨昌济的学历、爱好、学术渊源、个人品德和教学精神，也表达了这批青年对自己敬爱的老师深切的怀念之情。

杨昌济对青年学生的影响，也不仅止于新民学会的成员。昔年曾就读于湖南高师、后来成为《辞海》主编的舒新城回忆说：“在人格上最使我受感动者为杨怀中（昌济）先生。”“当时他教我们的是伦理学。他的道德观是融合中国的性理学与英国的功利学派的伦理观而贯通之，故极重实践。”^②“在行为上他那虔敬的态度，常常使我自愧疏暴，使我反省到养成‘事无大小，全力以赴’的习惯……在思想方面，他从人生哲学上，引导我知道中国性理学以外之西洋哲学学说，扩大了我的人生观，而使我知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体验着人类有无限的自觉的创造性等等……”^③杨昌济教授舒新城的课程为时不过两年，然而这种“潜移默化之功”，影

① 肖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人民出版社一九四九年出版。

②③ 舒新城：《我和教育》。

响了舒新城以后几十年的生活。舒新城认为，这是杨昌济“当时所不曾想及的。”^①

杨昌济给青年一代的影响如此深刻、巨大，有一定的时代条件，同时也是与他的生活经历、高尚道德和渊博学识分不开的。

杨昌济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这正是维新与守旧、革命与反动两种势力激烈搏斗的时代。一方面，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紧密勾结，加速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使国家日益沦入瓜分豆剖的境地；另一方面，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不断地与内外敌人进行着浴血苦战，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相继发生，极大地唤起了中国人民新的觉醒。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不畏艰难险阻，竟向日本和西方国家寻求真理。杨昌济就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真诚地向西方寻找真理一派人物中的一员。

出国之前，杨昌济在号称“荆蛮山国”的湖南，受过长期的旧式教育，对儒家经典，特别是宋明理学，有着很深的造诣，同时又广泛地涉猎了近代思想家王船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著作，也阅读过曾国藩的某些著作。到日本、英国和德国学习，考察先后达十年之久，又系统地了解 and 掌握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以及卢梭、斯宾塞、赫尔巴特等人的哲学、伦理学和教育理论。在此基础上“斟酌古今，权衡中外”^②，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加以抉择、取舍，从而形成了适应当时的社会潮流，蕴涵着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精神的教育思想。杨昌济的教育思想，

① 舒新城：《我和教育》。

② 杨昌济：《告学生》，载《国民》杂志一九一九年第一期，以下凡引用杨昌济本人的文字，只注篇名和出处，不注作者姓名。

内容精深、博大，特别是他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主张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强调教育的普及和提高、注重人才培养、强调教师以身作则的思想，以及教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许多合理主张，曾经影响过一代青年，对湖南的近代教育也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时代条件和他本人世界观的原因，他的教育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某些消极的因素。然而瑕不掩瑜，在今日它仍不失为中华民族一份宝贵的教育遗产。

我国春秋末年，儒家祖师孔丘首创“私学”，因材施教，诲人不倦，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千百年来成为美谈。宋代朱熹先后讲学于白鹿洞、武夷精舍和岳麓书院，刻苦著书立说，成为宋以后到清代中叶封建儒学“正宗”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杨昌济所处的时代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与孔丘、朱熹完全不同，就其个人的声誉和取得的成就来说，也无法相类比。但是，他们都曾为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奋斗不息，并在教育理论方面有所建树，对当时和后世发生了有益的影响，这是相同的。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革命史上，一批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和杰出战士，如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何叔衡、罗学瓚、陈昌、张昆弟以及至今还健在的李维汉、肖三等人，早年都出自杨昌济的门下。当然，这些伟大人物和杰出战士的成长，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个人长期的巨大努力，而且也还受过别的进步教师，如徐特立、方维夏等人的积极影响，然而他们在青年时期，特别是在长沙求学时期，都曾深受杨昌济思想、道德和学识的熏陶，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后人的回忆也曾不断予以证实。就这一方面来说，却是任何有成就的古代教育家所不及的。这种种情况说明，认真研究杨昌济的教育思想是十分必要的，如能从中汲取合理的成分，引为今日之借鉴，有助于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则更有意义了。

一、“与日新之世界同时并进”

杨昌济，字华生，留学日本时改名怀中，表示身在异邦，而心怀中土。一八七一年（清同治十年）五月十六日，他出生于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冲。

杨家原籍长沙金井蒲塘，世代以农为业，没有出过知名的读书人。大约在十八世纪末，祖辈迁到长沙东乡板仓，开始培养子弟读书。杨昌济的高、曾祖父都是“大学生”，祖父杨万英是“邑庠生”，于杨昌济出生前十年去世。父亲杨书祥系“乡里宿儒，以授徒为业”^①，捐过一名“例贡生”，在家乡度过失意的一生。

杨昌济开始求学的时代，正是清朝封建统治者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之后。为了消除农民起义的政治影响，中外反动派加强了对人民的思想钳制，大力鼓吹尊孔读经。清代中叶一度衰微了的宋明理学，经过曾国藩等人的提倡，这时又重新抬头了。杨昌济七岁“发蒙”，蒙师就是自己的父亲杨书祥。在父亲的耐心指点和严格要求下，他发愤攻读，刻苦磨砺自己，几年之间就熟读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阅读了中国古代哲学、历史、伦理方面的一些典籍。年事稍长以后，又攻读了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的著作。为应付科举考试，学会了写八股文。因此，儒家经典特别是宋明理学，给杨昌济的思想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① 曹典球：《杨昌济先生传》（未刊稿），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清代末叶的读书人，特别是当时湖南的读书人，对“中兴名臣”、“一代儒宗”的曾国藩十分崇拜。曾国藩是靠科举和武功发迹的官僚，由进士累擢为吏部侍郎。他一生潜心于宋明理学，以儒家正统自居。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打着反对“异端”的旗号，笼络了一批知识分子。在治学方面，他虽然“一宗宋学”，但又“不废汉学”，主张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这更赢得了各派知识分子的好感。因此，曾国藩治学、修身、待人处事和教育子弟的许多主张，在一个时期之内曾发生过深刻的影响。杨昌济青少年时代，也认真读过曾国藩的一些著作，后来还一笔不苟地用楷书抄录过曾氏“家书”，并拟节抄“家训”与“日记”，题曰《曾氏嘉言》，合并刻印出版。对于曾国藩的治学方法，杨昌济更是推崇备至。“昔曾文正自定课程，每日读史十页，终身不间断，此可师也。”^①在日记中类似的记载不少。他还以曾国藩的事迹为例，教育他的学生，也用以自励。

杨昌济踏进社会时，也象当时许多读书人一样，走的是封建科举的道路。一八八九年，他已经十九岁，便应长沙县学试，考了一个“邑庠生”，举族为之欣喜。一八九〇年，接着应湖南省“乡试”，考举人落第。这时，杨书祥已经病故，杨家经济景况日益窘迫，杨昌济本人到了“弱冠之年”，与向振熙已经结婚。为了寻求生活的出路，他便继承祖父、父亲的事业，初次在家乡开设蒙馆。这是他从事教育事业的正式开始。

作为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教育家，杨昌济个人的生活道路，是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革命的进程相一致的。他的教育思想的形成，大体经历了三个重要的时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① 《达化斋日记》（校订本），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

教育思想的萌发时期；由改良主义向民主主义转变的时期；民主主义教育理论日趋成熟，并在实践中取得杰出成就的时期。

从一八九一年至一九〇三年赴日留学前的十二、三年，杨昌济主要从事农村教育。这是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的萌发时期。

为了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他曾于一八九三年在长沙城南书院短期就读；在一八九八年的维新变法高潮中，又进岳麓书院短期学习。其余时间，几乎全是教书。除在乡下设馆以外，也曾在长沙城里的东茅巷授徒。一八九三年秋天，他再次参加“乡试”落第。一八九四年冬，他甚至写下了“孤愤遭穷厄，牢骚损岁年”^①的诗句，心情是深沉忧郁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生徒的授业，他也从不稍懈。通过授业，与学生建立了感情，他从中获得了生活的乐趣。比如，他在《杂感》诗中曾说：

松桂一庭绿，雨声凄正繁。
诗书从意读，景物未全残。
幸有生徒乐，初无风雪寒。
胡为常郁郁，天地尚平安。^②

的确，与生徒在一起的乐趣，暂时冲淡了他两次中试不第的个人伤感，经过教学生活的磨炼，也逐渐培养起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之情。

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和一八九八年的变法维新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把广大知识分子的民族自尊心唤醒

①② 《达化斋日记》（校订本），一八九六年九月初三日追记。

了，杨昌济的爱国热忱也因此被激荡起来。他从科举道路上迅速解脱出来，开始为民族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担忧，随后，便积极投身于日益兴起的变法维新运动之中。政治态度的这种重大转变，促成了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的萌发。

组织学会、创办学报、兴立学校，这是当时维新派改良政治、刷新教育的主要途径。一八九八年，变法运动进入高潮前后，湖南由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积极活动，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等人大力支持，维新派先后创办了《湘报》、《湘学报》，成立了南学会，又兴办了时务学堂，并聘请著名的维新志士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凭借着这些学会、学校的活动和报纸宣传的扩大，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便广泛地传播开来，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声势。在维新思想的猛烈冲击下，杨昌济的政治观点日益进步。他加入南学会做了通讯会友，积极参加了南学会组织的各种讲演会，热情地学习新学和新政，利用听讲机会向谭嗣同等人当面请教。在杨毓麟家初次读到谭嗣同的《仁学》，他便深有感慨地说：“人不闻道，是谓虚生”^①，因而对谭嗣同大加推崇。当时他按南学会布置撰写的《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的论文，在该会通讯会友的课卷中被评为第三名，并由学会推荐发表在《湘报》上。

为了适应改良主义政治的需要，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还倡议组织了“不缠足会”和“延年会”。“不缠足会”的章程中规定：学会提倡女学，入会者集资设立女子学校，使妇女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力。“延年会”则主张生活规律化，免除一切不必要的社会应酬，省出精力读书、办事。对于两个学会的宗旨，杨昌济极表赞

① 《论语类钞》，一九一四年长沙宏文图书社出版。

成，因而报名加入。积极参加维新派的实践活动，对杨昌济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决定意义。后来，他在谈到教育问题时，曾经多次提及这些学会对他的影响。

杨昌济读书时，曾自题书房曰“达化斋”，把所写的日记称为《达化斋日记》。开设蒙馆授徒以后，他仍然勤勉自学，坚持写日记。现存的《达化斋日记》，从一八九一年起。他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在这个时期的日记以及其它的论文中有所体现，概括起来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认为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于转移学生的性情。“能移子弟性情使笃厚，是第一等教法，教之本也，讲解经书，其用也，文艺末也。”^① 尽管他当时提出的“能移子弟性情使笃厚”还比较笼统、抽象，教学的内容也没有摆脱传统的经书，然而，提出转移学生性情“是第一等教法”，重视学生的道德教育，反对教书不教人，并且把儒家经典摆到了次要位置，这与几千年来一贯以尊孔读经为主课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第二、重视学生的智育发展，主张改进“村塾蒙学”的教学内容，提倡实用之学。他说：“今之教材童者，当以解目前通用之字义为主，而教以说部之文法。凡农工专门应知之事，与为人之大义，皆著成书。尽变以前无益之教法，要于三年四年，无不识之通用字义，无不解粗浅文法，则将来可以看浅近之书，可以阅演义之报，终身赖之矣。”^② 这种提倡实用之学的主张，实质上就是反对把“村塾蒙学”办成脱离农村生产、生活实际，成为封建科举附庸的倾向，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农民利益一定程度的关心。这

① 一八九二年《达化斋日记》（未刊稿）。

② 《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载一八九八年《湘报》第一百五十三号。

是与他长期生活在农村，并且在农村从事教育分不开的。

第三，处理师生关系时，杨昌济主张把“生徒当儿侄”^①，强调“不动声色，微言感人”^②，反对“责数”多于诱导，这与封建的“师道尊严”又是相对立的。他联系自己的教学实践，检查自己气质近于刚暴，“心中无宽和之气，面目无温和之象，言则激辩，事则迫切，待弟子则责数多于引诱”^③，这是很不应该的。他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杨昌济是一九〇三年春天出国留学的。这时他已是三十三岁之年，有了十年以上的教龄。在海外刻苦磨砺、寻求真理的十年，是他在教育思想方面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向民主主义转变的时期。

一九一三年，他学成归国后谈到当年留学的动机时曾说：“余自弱冠，即有志于教育。值世局大变，万国交通，国内人士，争倡变法自强之议，采用东西洋各国成法，创兴学校，以图教育之普及。余以为处此时势，非有世界之智识，不足以任指导社会之责，于是出洋求学，留于日本者六年，复至英国留居三年有余，又往德国留居九月。”^④他在这里所讲的“采用东西洋各国成法”，就是学习日本、英国、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经验，以发展本国的教育事业，达到变法自强的目的。这与当时维新派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杨昌济初到日本，进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创办的弘文学院。

① 《达化斋日记》（校订本），一八九六年九月初三日。

②③ 一八九二年《达化斋日记》（未刊稿）。

④ 《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载《湖南教育杂志》第十七期，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

他先入师范科，不久转入普通科，潜心研究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课程。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兼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他热爱教育事业，对中国的事务比较关心，但政治观点比较保守，曾以黄种人与白种人对抗为理由，主张汉族要安于满洲贵族的统治，以维护国家的统一。杨昌济在弘文学院学习刻苦，成绩优良，深得嘉纳治五郎的赏识。一九〇六年，他在弘文学院毕业，由于嘉纳治五郎的支持和引荐，随即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攻教育学，修业期限为四年。一九〇九年春天，由于好友杨毓麟、章士钊的介绍，清政府驻欧洲留学生总监蒯光典召杨昌济赴英国继续深造。杨昌济应召离开生活了六年之久的日本，远渡重洋，到达英国，随后，进入苏格兰的泥北淀（现译为爱伯汀、阿伯丁）大学，在哲学系专攻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杨昌济在留英期间，生活简朴，学习勤奋。据一九一〇年《湖南教育杂志》第二期报道，杨昌济“所修伦理学科，曾得分数至九十分以上，足称优胜。”一九一二年春天，他在泥北淀大学结束了艰苦的三年学习生活，得文学士学位而毕业。

在泥北淀大学就读期间，他特别注意调查英国的教育状况，在该校毕业以后，又专程前往德国，进行了长达八、九个月的考察。考察的重点是教育，考察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幼儿园、孤儿院、小学、中学和大学，连职业学校、工人夜校也不放过。他考察时十分细心，从学校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学校纪律，到学生的奖惩制度；从学校领导管理体制、师资培养，到经费的来源、开支等等，都无一不——了解，详加记录。对英、德两国的社会道德、风俗习惯，大至法律制度、言论自由、通信自由，小至不说谎、不随地便溺、吐痰等等，他都注意观察，联系国内情况进行对比。回国以后，或专门撰文加以介绍，或在教学

中详加解释，希望引起社会的注意，以资借鉴。

杨昌济是个与时俱进的人，而且有善于学习的特点。在国外专心研究了资产阶级的哲学、伦理和教育理论，又深入考察了日本、英国、德国的教育状况和社会风俗以后，他的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有了很大进步。可惜，截至目前为止，没有找到他在国外写回的大量书信手稿，但是，从他出国之初发表在留日学生所编的《游学译编》上的部分日记，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由改良主义向民主主义转变的实际情况。

首先，对君权与民权、“教旨”与“旧俗”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君也者，所以保万民之生也；教也者，所以保万民之生也。如使君权太重而致有亡种之祸，不可以变法有碍于君权而不变也。如使旧俗不变而致有亡种之祸，不可以变法有违于教旨而不变也。况还民以应得之权，于尊君之大纲无悖也，顺天地自然之理，于立教之大纲无悖也，又何疑乎！”^①这段话表明，杨昌济当时虽然还没有摆脱“尊君”、“立教”传统思想的束缚，但在君民关系上，认为君应为民办事，如君权太重影响了民权，就必须变法削弱君权；如果施行教化的宗旨不利于改变社会的旧俗，就应该顺应天地自然之理改变旧俗，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亡国灭种之祸。他大胆抹去封建君权、教旨头上神圣的灵光，把它们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下，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其次，他从“以民为主”的观点出发，提出要正确估价“小民”的作用，重视“小民”的教育^②。他正确总结了戊戌变法失败的惨痛教训，认识到只依靠清朝政府内部少数开明的统治者实行自上而下的变法，必然“效速而易迁”，终究避免不了失败；如果

①② 《达化斋日记》，载《游学译编》第八册，一九〇三年出版。

重视“小民”的教育，努力开发民智，依靠“小民”自下而上地进行变革，则“效迟而可久”，成功的希望必大。因此，他强调：“欲强中国，当蓄力于小民。士大夫积其教化之功，小民各自积其学问、阅历、兴举、扩充之功，积累久之，民智大开，则勃然兴起而莫能御之矣。”^①

再次，强调变科举、变学校，先要变思想。他认为封建科举制度束缚思想、断丧人才，使人的精力疲于制艺、律赋、试帖、楷书之中，无暇治实用之学，因而招致万事堕毁，四海困穷，一筹莫展，“此无学之害，彰明较著，虽有辩者，莫能为讳也。”^②针对这种情况，他主张“欲变法必先变科举，变学校；欲变科举、变学校，必先变学术。”^③

杨昌济之所以特别看重变革学术思想的重要性，这是因为他认识到了精神一类东西有巨大的能动性，对社会的进步、教育事业的发展，能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一九〇一年前后，清王朝的慈禧集团迫于国内形势的发展，为了欺骗社会舆论，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得不实行废科举、兴学堂、派遣留学生等“新政”。但是，国内各级各类学堂仍然以忠君、尊孔为教育宗旨，以“四书”、“五经”为主课。杨昌济洞察这种“新政”只是形式的变换，而不是实质内容的变革，于是，便有针对性地提出变革学术思想。他认为学术思想不仅是学校的灵魂，而且是立国之精神，要求加以变革，这是有进步意义的；然而他不懂得，任何学术思想的变革，首先必须改变它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物质条件。同时他也不了解要彻底清除科举制度的遗毒，刷新学校的教育，光变学

①③ 《达化斋日记》，载《游学译编》第八册，一九〇三年出版。

② 《劝学篇》，载《公言》杂志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一四年十月出版。